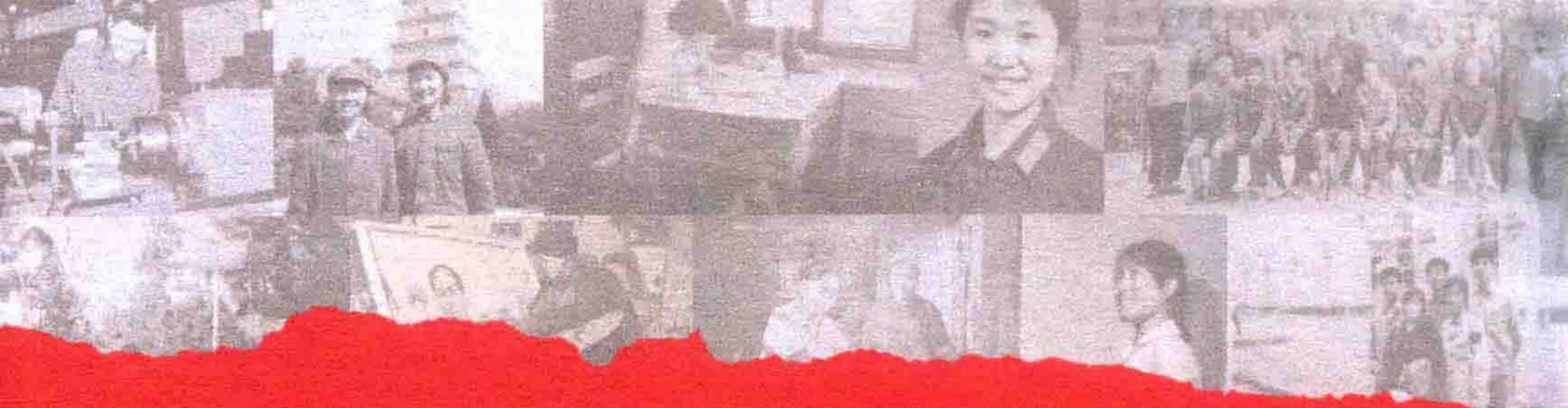




新三届 致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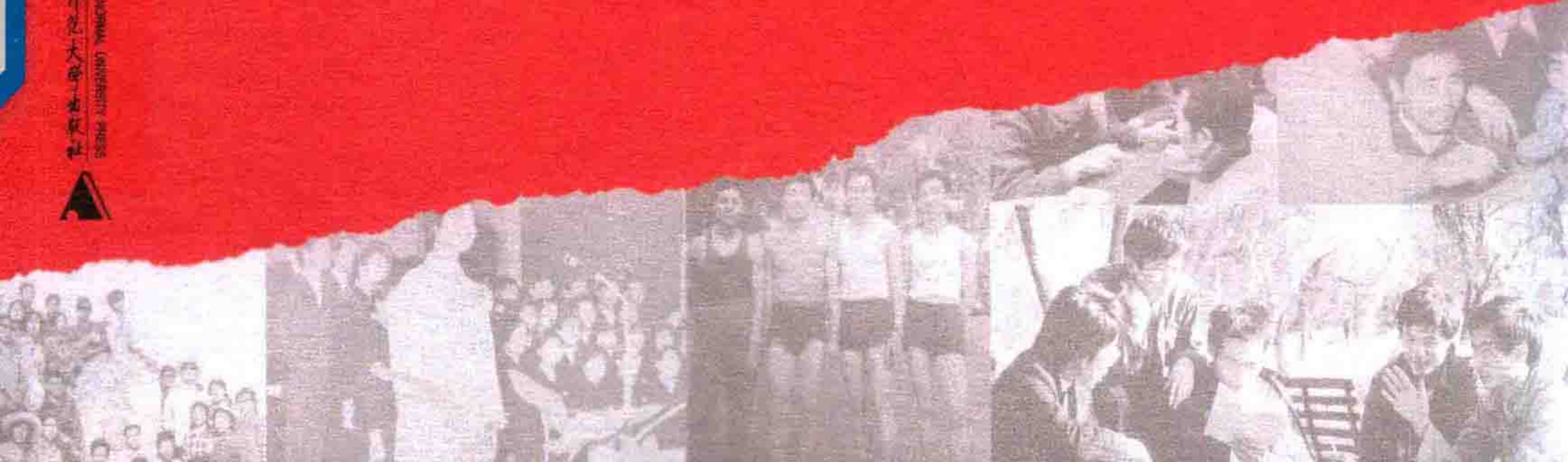
主编

东方平 少达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广东财经大学出版社



新三届 致新生

XIN SAN JIE
ZHI XINSHENG

主编 ——
东方平 少 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三届致新生 / 东方平, 少达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3 (2018.5 重印)

ISBN 978-7-5598-0565-2

I. ①新… II. ①东…②少…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15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昭泰子隆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南宁市友爱南路 39 号 邮政编码: 5300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30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一

高考，一代人与一个国家的故事

| 张墨宁 |

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决定他们（恢复高考后的三届考生）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 40 年里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从 1977 年 10 月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公布，到当年 12 月参加考试，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改革开放即将启动的人才储备，正是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被决定的。从“老三届”开始，20 世纪 70 年代末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以这场考试为起点，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开始承担起了构建新秩序的历史重任。

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由此，一个谋求伟大复兴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养知识分子和遴选精英的轨道上。

个人命运的转折

回忆 40 年前的那场考试，几乎所有亲历者都把它看作个人命运的转折。1977 年 10 月，政治形势并不明朗。在田间地头、车间农场劳作的年轻人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生活轨道将发生改变的可能。

翻阅各种回忆录，我们会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趋于一致，无论他们彼时在哪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都有着共同的对现状的苦闷和对前路的茫然，而恢复高考的消

息带给那一代年轻人的冲击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熊晓鸽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开始备战高考。父母为了让他安心复习，把自己住的房间让了出来。整整半个月，他都在这间屋子里闭门苦读，床上堆满了复习资料。

两个多月后，熊晓鸽被湖南大学英语系录取，虽然与心仪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失之交臂，但总算进入了离家最近、当地最好的大学。后来，他成为 IDG 资本全球董事长，被称为中国“风投教父”。

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的王辉耀是广州外国语学院 1977 级学生。他“接受再教育”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与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脚行走在泥泞小路上的日子，让他很快就感觉到身处“广阔天地”的残酷之处。也是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消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同样觉得机会来了的，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北京电影学院 1978 年才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赶赴考场。

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的葛兆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并接着忙他的秋收采购，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才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础并不好。1966 年上初三之后，学校就开始停课了。1968 年，葛兆光来到贵州凯里的一个村庄当了知青，后来又到处瓦厂、农药厂工作。从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只好选择文科，但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只好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北大中文系当年在贵州招生仅有两个名额，高考时已经超过 25 岁的葛兆光幸运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录取。可以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葛兆光正是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身份反差，这是今天人们回忆 40 年前那场考试时最直观的印象。1977 年参加高考的有 570 万人，被大学录取的仅有 27.3 万人，1978 年高考有 610 万人报名，最终录取了 40.2 万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像王辉耀、张艺谋、葛兆光他们一样，前一天还做着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便摇身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样的对比使得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逆袭”。

但实际上，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并非戏剧化和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原本就从未放弃读书。葛兆光下乡时带的一箱书里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辉耀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英语和各种知识。他们的身份转换只是一个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秩序的结果。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了纯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经的磨砺和压抑也给了他们其他任何一代读书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来源。

与此同时，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种种变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北大和清华分别提出的两个口号——“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精英认同。学者许纪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讨论和辩论。

参与改革和法治建设

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仲裁律师”称号的陶景洲回忆，在法学名师的影响下，他们七七级法律系的 82 名新生开始接触新的知识领域，常常在宪法与行政法学大师龚祥瑞的小院里一起讨论欧美法律问题。

北大法律系七七级后来被称为法律界“黄埔一期”，有的进入了政法系统、政府部门，比如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的马迎新，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的武树臣，曾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长的杜春；有的则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法

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曾任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院长的何勤华等。

七七、七八级的法学“明星班”还有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七八级。2016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经过表决，任命了新设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

至此，六大巡回法庭的“一把手”中有三位是西政七八级本科生：江必新任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景汉朝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长，李少平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

西南政法大学在举办七八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做过一个统计，这届学生中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担任过厅局级领导职务的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大约在2007年前后，拥有经济学和法学背景的官员开始在新一轮的代际交替中崭露头角。此时，距离他们上大学已经30年。普遍进入“知天命”年纪的政界精英到了收获成果的旺盛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党政事务重心向经济转移的变化让这些专家型官员得以发挥所长、积累丰富的从政经验，随着治国理政思想的变化，法治化进程需要吸收更多拥有法学思维的人才。北大经济系七七、七八级就有至少9位省部级官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他们密集分布于各个场域，无论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源自权力、学识还是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给这一代大学生附加上了集体的光环。他们既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受益者，也是新旧交替以及一个国家回到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承担者。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经验以及智识反而成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们身上共同的精神气质才是最鲜明的符号。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两个极端中度过的，前半程劳作乡野，后半程潜心求学。

投射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气质可以用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概括。

这一点，在商业领袖身上也有所显现，冯仑和李东生就是七七、七八级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冯仑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冯仑参加了高考，进入了西北大学。

后来回忆时，冯仑说，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高中校园里完全没有紧张备考的气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荐制被废除，全国各地才沸腾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复习，冯仑被西北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刘世锦等。

这一年，现任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参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到了广东惠阳马安农场，四年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与其后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不同，“新三届”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结果，知识与个人命运以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也因此被中断。当他们回到城市，回到阶层流动的正常轨道时，再去观照底层社会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岁的知青周其仁听到农场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此时，他已经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狩猎、锄地，也喜欢发表高见。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如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一边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是亚当·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带着这样的冲击和疑惑，周其仁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那段生活，大约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开端。

有学者曾撰文称，改革开放后，七七、七八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反思“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进行批评乃至反叛。当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但

无论改革还是游离，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们身上的光环终将随着历史而消退，但个人命运的转折将始终具有高考制度的标本性意义。时至今日，高考依然是精英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未来仍将不可替代。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依然是改变个人命运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40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对年轻人的意义从未改变。

（本文作者系《南风窗》原记者）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来龙去脉

| 樊克宁 |

1. 周恩来批极“左”

挽救高考“一寸寸掘进”

1971 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 6 年，大学也已停止招生 6 年。也正是在这一年，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罕坠机身亡。

1972 年恢复招生 工农兵大学生诞生

林彪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会批极“左”路线，指出“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1972 年恢复招生，高校进入工农兵大学生时代。

这时，教育部已被撤销，管教育的是国务院科教组。科教组向吉林省借人，为恢复大学招生搞调查，写简报。1960 年从东北师大毕业后留校当教员杨学为由于参加过东北师大的招生工作，就被借调到科教组。

1971 年，在张春桥的把持下，《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简称“全教会纪要”）抛出“两个估计”，其一为 17 年来的教育战线“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其二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

根据这个“全教会纪要”，1972 年大学恢复招生，不恢复高考；不招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一般应有相当于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执行十六字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也是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颠覆的主要内容。

“39号文件”出台 智斗“全教会纪要”

1972年7月15日至8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高校停止招生6年后的第一个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杨学为作为会议工作人员，见证了国务院“39号文件”即《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的产生过程，参与了“39号文件”对“四人帮”的“全教会纪要”所做的两处重大修改。这两处重大修改，是周总理同极“左”路线进行斗争的“一寸寸的掘进”。今天回忆往事，杨学为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两处修改都是关于“文化条件”的。

第一处修改，是将“全教会纪要”规定的大学招生文化条件“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改为“目前，应保证学生具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这句话中增加了“目前”作为时间限定，为将来再次修改埋下伏笔；增加了“毕业”作为必须强调的条件，因为在北大、清华的试点中，有未达到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人也上了大学；增加了“实际”以针对当时很多学校不上课，即使毕业也不一定有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的情况；增加了“保证”以确保生源的初中毕业文化水准，也为实行文化考查提供了依据。

另一处修改，是在推荐制招生办法之外增加了“文化考查”。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文化考查”虽然不是高考，但实质是起考试作用，因此考查结果就应在录取时起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因为“文革”正是以废除高考为“突破口”的。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当凶险，杨学为记得，在加上“文化考查”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又加上了一句暗藏玄机的话：“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39号文件”发向全国，凭着“文化考查”这一条，不用动员，中小学生的学习风气有所好转，下乡知青也开始读书了。与此同时，“文化考查”也为张铁生事件埋下伏笔。

张铁生“白卷”书信 被人当政治“石头”

在当时，大事小事都同“路线斗争”有关。周总理强调基础理论学习，批极“左”，被“四人帮”说成“回潮风”“基础风”。毛远新（“文革”时期任辽宁省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毛泽东之侄）说：“这下把知识青年拔根了，不会扎根农村了。”他说：“这不单单是个单纯的业务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这是一场斗争，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有人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都是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的。”

恰恰在这时，毛远新听说了张铁生参加文化考查时在试卷背面写信的事，当即如获至宝，把它当成了一块打向国务院“39号文件”的“石头”。文化考查被毛远新攻击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的管卡压”，被迟群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表现和影响突出反映在文化考查上”。

事实上，人们在报上读到的张铁生的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同原件已经有所不同。其中有一段关键的话被删除：“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也就是说，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信的动机，是想解释为什么没考好，希望得到谅解被录取上大学。他每科都考了，其中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并没有交白卷。

34年后，杨学为这样评价“白卷事件”：“张铁生希望上大学没错。当时没有时间复习，他复习一下，会考得更好。他为考不上而焦虑，可以理解。可能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也不能认为他说假话。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他写这封信，算不得什么阿谀谄媚。他的问题在于，毛远新正好需要这样一个典型。因为知识青年要永远在农村扎根，需要这么一个典型来反击周恩来总理强调基础理论学习的观点。所以他的信被利用，成了一块政治‘石头’，他自己也被江青封为反潮流典型，被用来证明搞文化考查是对工农兵的专政。”

“群众推荐”形同虚设 招生两千“走后门”两百

杨学为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努力挽救高考，就这样在‘四人帮’的围攻下而夭折。”

张铁生事件的后果是，手上的老茧被认为是上大学的最好的条件，同时群众推荐制形同虚设，“开后门”成为风气。“文革”中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已经有人“走后门”了。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被发现“走后门”的就有242起。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有的村干部让

自己和亲戚好友的孩子排队，有的竟排到了1980年。

2. “文革”中邓小平拯救高考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恢复了教育部，周荣鑫任部长。1975年，全国招生会即将召开，杨学为再次被借到教育部。

毛远新搞“三来三去” 周荣鑫以整顿相抵制

这时，毛主席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远新乘机在朝阳农学院搞“三来三去”：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上大学还回去当工人；从哪来回哪去。毛远新还提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52岁识字不多的农民“王大学”成为大学生的榜样。对此，沈阳机电学院自动化3班的七名工农兵学员贴出大字报，反对大学是培养工人、农民的提法，招来舆论“围剿”。

杨学为说，对毛远新的这一套，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是抵制的。邓小平1975年进行整顿，说大学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周荣鑫紧跟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在教育部搞整顿。周荣鑫说：“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狂，经济战线猖狂，我看教育战线也很猖狂。”“周总理在1972年接见李政道时有一个谈话，说现在高中生毕业要劳动两年再上大学，这是个试点，还不一定。像基础理论好的，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杨学为说，1975年，周荣鑫问教育部计划司管招生的负责人：“周总理的指示对不对？”对方回答说：“对。”周荣鑫继续问：“对，为什么不执行？”对方没有回答，周荣鑫又问：“去年不执行，今年也不执行，明年执行不执行？”对方只好回答：“当然执行了。”所以，1975年教育部派出两个组搞调查，杨学为参加往广东、福建、上海的调查组，调查招应届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事情，准备第二年执行。

三省市调查“文化考查” “反击右倾翻案风”骤起

杨学为清楚地记得，当时广东是广外（原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招了一个年级100多人，招的是初中毕业生。当时省招办的刘育民带杨学为去一个农场搞调查，令杨学为感觉让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正确的。

杨学为在广东调查“文化考查”，把人带到一个公共汽车公司，他在调查时问道：“你们怎么考数学？”他们说：“售票员早上出去时拿走一沓票，晚上回来看看卖了多少张，钱对不对，这个就是数学题。”广东调查完了，杨学为就到福建。福建的文化考查题是挖水渠，渠多深、多宽，一共挖了多少立方。考这个比考计算公共汽车票难一点。然后调查组又到上海，还没等开始调查，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他们也就被通知打道回京。

杨学为回忆说，“1976年，‘四人帮’把周恩来关于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当作靶子，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周荣鑫被迫害致死。我因为公开发言支持周荣鑫的‘教育战线形而上学猖狂’的观点，也被从教育部退回学校，到农场劳动去了”。

3. 邓小平领导实现“恢复高考”

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1977年，又要开招生会了，教育部又要借人，杨学为第三次被借调进教育部。这一回，他见证了“四人帮”倒台后拨乱反正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实现了“恢复高考”。

邓小平复出请缨抓科教 恢复高考过程千回百折

杨学为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那年开过两次全国招生会议，后一次会议甚至开了45天，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再没出现过。

这两次全国招生会，杨学为全程参与。第一次招生会于6月29日到7月29日在太原召开。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再次复出，华国锋刚刚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循”。因此，教育部拿出来的招生方案基本上仍然维持“文化大革命”时的那一套，杨学为甚至认为它“还没有达到1973年‘39号文件’的水平”。各省招办对教育部的做法很不满意，会上争论很激烈。

杨学为说：“邓小平1977年7月16日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教，首先考虑的就是恢复考试和招应届生的问题。实际上，在1974年那次复出时，他就已经设想要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所以，1977年这次复出之前，他就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是有所准备的，非常明确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在科教会上大家提了他才随便讲的。”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刘西尧，他的回忆录记载了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邓小平问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如果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小平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西尧说：“刚送出去。”邓小平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当时已经是8月8日了。然后，教育部马上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会，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时间长达45天。

两次招生会争论激烈 邓小平一句话“定音”

杨学为说：“一年开两次招生会，这是第一次；招生会开45天，开得这么长也是第一次。为什么？因为争论很厉害！‘文革’还肯定着呢，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都在那儿呢，‘四人帮’关于教育的‘两个估计’都没推翻呢。在这个情况下，要招应届高中生，那就不叫工农兵大学生了，那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吗？当时很多政治问题还没搞清楚，前提的问题都没解决，就要解决招应届生和恢复高考这两个具体问题，而这两个具体问题在教育上虽说是大问题，但是从全国的政治局势来说是小问题，所以非常困难。”

“参加会议的什么人都有，有老干部，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年轻干部‘造反派’……争论非常厉害。再加上教育部领导一直不表态，就一直争论。一直拖到9月19日，教育部就被邓小平批评了。邓小平说，‘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邓小平一讲话，形势就急转直下，教育部就一致同意了。”

4. 邓小平亲笔修改“政审标准”

当时，杨学为在大会文件起草组。他记得，起草的文件中，其中一个“政审标准”。“文革”中的政审标准是“血统论”，要查“内外三代”，“八大父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伯、叔、姑、舅、姨父母等），要“三代赤贫”，社会关系中没有任何“分子”，本人表现要“党团化”。这个标准把很多优秀人才挡在大学门外，所以要重新写。

烦琐政审全部勾掉 强调重在本人表现

杨学为说：“起草政审文件时，我们担心由于恢复考试，强调文化，会被认为是注意分数，降低了政治标准。我们选的一定是政治好的，文化也是好的。不像‘四人帮’那样，只要所谓政治好，不要文化。所以我们把政审标准定得特别高，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比如‘政治历史清楚，热爱毛主席，热爱华主席，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有一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集体劳动，遵守革命纪律，联系群众，决心为革命而学习’等。”

教育部把送审稿交给邓小平，他看后，连说三个“烦琐、烦琐、烦琐”，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大笔一挥，全部勾掉。然后，他亲自起草了一段。后来1977年文件上的政审标准，就是按邓小平写的照抄，中心思想就是“本人表现好，择优录取”。

杨学为补充道：“我们把邓小平写的政审标准拿来后，仔细一看，没有‘拥护共产党’，我们就把‘拥护共产党’加上了。当然，他看过后也同意。（这份政审标准）拿去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了。”

取消四个等级 解放一大批人

虽然政审标准是“重在本人表现”，但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大阻力。当时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没改正，“这些人的孩子政审都是不合格的，其中有些人考试成绩不错”。杨学为说：“1977年高考录取时出现大批上访的。教育部直接处理这些问题，主要是对‘重在本人表现’的政策不落实。”

从此以后，高考政审就取消了“文革”时的绝密、机密、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只有合格和不合格，然后把确定不合格的权力收到省里，县里不可以决定哪一个人政审不合格。接着，又取消政审这个词，改为政治思想品德考核，“阶级斗争都不存在了，怎么还搞政审呢”，杨学为说。

5. 各省份副厅长一场大辩论

1978 年补了 1977 年的课

1977 年的招生会议，重点解决了恢复高考和招收应届毕业生的问题，但是仍然遗留了一些重要的认识问题没有深入解决，主要是对考试的认识。于是，1978 年召开的全教会和招生会，就有了一场关于考试问题的大辩论。

杨学为说：“参加的都是各省份管招生的副厅长。有些曾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或大学的副院长、副书记。他们中间有的人在分组讨论会上说，‘文革’前还有个阶级路线的问题，贫下中农还要照顾，现在都是凭分录取了，也不提要照顾贫下中农了。”

“《会议简报》马上登了，一看简报，全部哗然。其实说这些话的都是很好的人，‘四人帮’时挨整过，绝对不是‘四人帮’的爪牙。这些人在会上挨批，回省份后也挨批。当时还是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有这些观点，反映了 1957 年以来‘左’的思想仍然是很深的，恢复高考这一制度要克服很多思想障碍。我觉得 1978 年的招生会，补了 1977 年的课。”

杨学为这样评价恢复高考事件：“邓小平复出之后抓科教，就抓住了整个社会的龙头。而抓科教，他先恢复高考，从政治上来说太高明了，一下把几千万知识青年抓住了，把几千万家庭抓住了，厉害，大政治家啊！”

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开始，杨学为正式留在教育部，一直在高考招生岗位上从事领导工作，干到 2000 年退休。

（本文作者系《羊城晚报》首席记者，著有《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本文为作者对原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的采访整理，原载于《羊城晚报》2007 年 6 月 16 日，有删减）